

一個幻滅的夢想

張一蕃教授

——我們希望交青真正成爲全校師生互動的橋樑，這只是起點——

編者

暑假裏，一位我所敬愛的好友離開臺灣，「回」美國去了。臨行前，他寫來一信，其中有這樣的一段：「我之有心以此爲家，不待繁言；然而目前學術上、經濟上皆無可取之建樹，縱有滿腹經綸，又怎能實踐一二？本欲效任公先生之『新國民，啓民智』，開導學生，然而既無法吸引上智之材，又無從改變現狀……夢想終舊幻滅。」我的心情沉重了一陣子：一方面，我爲失去了一位工作中合作無間的伙伴和感情上相知互信的益友而覺得遺憾；另一方面，以上的那幾句話，也在我心底激起了強烈的共鳴。

一年多以前，整裝回國的時候，心裡感覺到無比的興奮，因爲終於要回到家鄉來工作了。初到交大的那段日子，如果有人問我打算在這裡留多久，我總是毫不猶豫的說：希望能長留下來。然而，一年後的今天，對於同樣的問題，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熱心所以會冷淡下來，固然有一些個人的因素在其中；而對於目前所從事的工作的價值的重新衡量，無疑的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對於交大的工作環境，我始終覺得相當的滿意。在國內，這該是一所朝氣蓬勃的學校了。無論作研究或是教書，只要你有能力，就可以儘量的發揮。然而，在檢討過去這一年裏自己所做的種種時，我不免會有些懷疑：這樣做值得嗎？說到作研究，若是爲了個人的興趣，國外有的是更理想的環境；若是爲了些堂皇的理由，我却發覺我這個小兵和領導我國科學發展的將軍們在基本觀念上就有很大的差距。說到教書，若只想當個教書匠，那又何必到交大來？儘可以去別處享受更高的待遇，更愜意的生活。選擇了這一個職業，不是爲了謀生餬口，總是有一些理想的。不幸的，在今天看起來，一年前的那些理想，似乎也難免像好友信上所說的那樣，成爲幻滅的夢想。

從讀大學的時候開始，我就認爲教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簡直可以算是天下的第一等大事。作了二十多年的學生，教過我的師長

總有好幾十，但是却只遇到一位讓我衷心尊敬和佩服的好老師：那是在研究所時的指導教授，一位六十多歲的瑞士老先生。他獻身於教育工作有四十多年，直到第三次心臟病發，倒在辦公室裏。他為人熱誠而正直，做起事來一絲不苟，對於學生更是關懷備至。三年多來，在他的指導之下完成論文，欽佩感激之餘，也就很自然的把他列為榜樣。自己雖然沒有他那種獻身的精神，但是朝着一個理想的方向去努力的熱情，總是有一些的。所以，初回來的時候，我也曾經希望能夠做一些「新國民，啓民智」的工作。

我覺得，大學的教育，不應該只重視既有知識的傳授，而應該也把重點放在做學問的方法上。因為一個大學畢業生，一方面在當時的社會上是個中堅份子，另一方面，對於學術文化的發展，也負有繼往開來的重任。所以他不僅需要具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以站穩個人的崗位；同時更要能夠不斷的增加和充實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以推動社會向前進步。一個學生如果能夠學到怎樣利用自己的智慧，去獲得更多、更新的知識，以及當問題來的時候，怎樣根據自己的判斷，運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去解決它們，這將遠比學會一些方程式，一些電路，更加有用。我理想中的大學教育，是藉着學科的講授，啓發學生去對有關的知識作更深入的探索。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進而發掘新的問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不僅僅學得了知識的本身，同時也學會了求知的方法。

然而，理想歸理想。經過了一年多的摸索，我開始懷疑自己的理想是不切合實際的了。許多的同學（假使不是大部分的）似乎都有一種急功近利的現實心理。他們對於求知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沒有興趣；他們所關心的是，學了某一門功課，對將來求職找工作會不會有幫助。於是有人問：學化學、學微積分，甚至學普通物理有什麼用處？他們想一步登天的學半導體，學品質管制，學計算機程式。影響所及，連科系在安排課程的時候也以對將來出路影響的鉅微當做衡量某些科目的重要性的參考了。

傅斯年先生在二十年前就曾經大聲疾呼：大學不該採雜職業學校的用意，更千萬不可變為商場。大學和專職學校不同的地方，在於大學是以學術為本位而專科是以應用為本位。大學工學院教育的目的，絕對不是要把所有的畢業生都送進工廠裡去從事技術員的工作——這該是專科的任務。然而，由於時下社會裏學位至上的觀念依然很深，許多理該由專職學生去擔任的工作，也一定要找個大學畢業生來作，而偏偏又有那麼多的大學畢業生願意去作。於是大學教育也就變質了。學生們一窩蜂的湧向少數熱門的科系，為的只是在畢業之後憑着文憑找到一個待遇較好的工作。這樣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固然也許有一技之長，但是却難有多方面發展的潛力，也不會有在學術上求深造的意志，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優秀的技術人員。而這樣的技術人員，由專科教育，或是在職業專業訓練，可以在更短的時間之內訓練得更加優秀，大學又何必越俎代庖呢？

說到學校不可變為商場，讓我先引傅先生的一段話：

「學校是商場嗎？讀者或者說，千不該，萬不該，你有此一問。然而請看：今日何以工醫最先？經濟亦不落後，而純學術性的科目甚少，這不是為了將來的職業嗎？既是為將來職業，不拿學校看作商場嗎？那麼這問題也就不簡單了。」

學校應該是一個近代主義的教堂，使人由此得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該是一個商場，使人唯利是圖，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課題。」（註）傅先生二十年前說的這些話，在今天讀起來，依然能够發人深省；因為二十年來，問題並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了。在新科舉制度之下，學生固然沒有選擇學校和科系的權利，學校也無從選擇學生。一些別有所圖的人，藉着辦學作為謀利的手段，這固然是名符其實的「學店」；而即使有心要辦好學校的人，為了吸引好的學生，也不得不讓學校商場化了。君不見那琳瑯滿目的科系名稱？還有那商場上常用的宣傳、廣告，甚至贈獎的辦法，也被用來招徠學生。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學進到大學之後發覺大失所望，但是我相信每一個辦學校的人都有他的苦衷。誰不希望吸引上智之材？誰不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在學生身上實現？然而，大部分的學生到大學來却都只有一個目的：希望四年的教育能够幫他們找到一個好職業。由於社會經濟的畸形發展，造成大眾普遍的重利心理，再加上新科舉制度扼殺了學生的興趣和理想，這樣，學校焉能不變成商場？

這一年當中，讓我感觸最深的一點，是同學們的普遍缺乏責任感。我們且不談什麼國家、社會的大道理，只說說最起碼的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該有的負責的態度。作一個學生，求知理所當然是本分之內的事。然而，許多同事和我都有同樣的感覺：同學們的被動性太根深蒂固了。能够把課本和習題按照指定的進度去讀去作的，已經難能可貴；會自動的去讀參考書，旁徵博引的以求融會貫通的，簡直是鳳毛麟角了。大部分的同學，幾乎都只為應付考試而讀書。說來也真可悲，考試本來只是教師藉以了解學生學習成績的一種方法，而今却變成了驅使同學們讀書的唯一工具！學校重視考試，學生重視分數，這樣捨本逐末所造成的後果，就是嚴重的考試舞弊的風氣。說考試舞弊在交大是一種「風氣」，我想並不過分。從與同學們的交談，和幾次監考和閱卷的經驗當中，我得到一種印象：許多同學似乎都不以為考試時投機取巧是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了。我根本不贊成學校對期中考和期末考所採取的方式，座位分排，兩人監考，一付如臨大敵的樣子；而事實也證明，這樣做未必就能消彌舞弊的行爲。我總覺得，這樣做法是對同學的一種侮辱，我也曾經奇怪，為什麼同學們會樂意接受這種待遇，難道一點榮譽心都沒有嗎？在許多不同的場合當中，我逐漸的體會到了答案。我很願意尊重同學，但是却發覺，尊重他人，常常並不能換得他人對你的尊重。讓我們舉兩個實際的例子吧：

教室裏，下課鈴剛響過，教師正趕忙要把一節課所教的作一個歸納，而下一堂課在這間教室上課的另一班的學生却已迫不及待的一個個從後門湧了進來。教師停止了講課，望着他們，他們也看看教師，然毫不客氣的坐了下來。

足球場上，正式的比赛正在進行。一班剛下了體育課的同學，三五成羣的漫步橫越過球場。場上的球員請他們繞道，以免妨碍比賽；他們回頭看看，依然我行我素的繼續他們的散步。

有人告訴我，在這些場合，只須板起臉，吼一聲，保管那些搶座位的不敢湧進教室，踱方步的也會急急讓開。我不免大惑不解：這些難道就是標榜「交大人」而沾沾自滿的一羣嗎？不懂得尊重他人，也不能感受到他人對自己的尊重，沒有爲自己的行爲負責任的擔當，而只知投機取巧；說得露骨些，這就是一種奴性。十多年的教育，造成的却是這一種蔚爲風氣的奴性，焉不是一項徹底的失敗？

這項失敗應該歸咎於誰呢？學生嗎？不，他們是受害者。訓育工作人員嗎？也不，他們的力量太有限了。一個青年，在進入大學之前，至少已經受了十多年的教育。這十多年的教育，包括了升學主義的學校教育和功利至上的社會教育。所以許多大專青年的心中所想的，過去唯有升學，如今只有賺錢。除這兩件事，還談什麼責任和理想？周圍的人，不過是考場上、商場上競爭的對象。衡量一個人，只須看他聯考分數的高低，或是每月收入的多寡；還有什麼比這些更實際的？人與人的關係，就只是彼此利用，彼此競爭，何必必要相互尊重呢？歸根結底，今天教育的失敗，我以爲完全是由社會風氣和制度所造成的。

憑着一個人的力量，你雖然可以不與社會風氣同流，但是却不可能扭轉它。你也可以不依循社會既有的制度，但是這樣却很難做成任何事。這就是理想和現實的衝突。

我能够了解我的好友離開臺灣時的心情。因爲我自己，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理想被現實壓迫而趨於幻滅，是一件最痛苦的事，但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不會彼現實吞噬的，他會記這痛苦的經驗，而到另一個現實的環境裏，繼續追求他的理想。

註 傅斯年：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卅九年十二月），見「傅斯年選集」

後記：交青的編輯同學很早就向我索稿。假期裏隨筆記下了一些感想，如今整理出來，還是不成一篇東西。我只是寫出我所想的，並沒有抱怨或責怪的意思。在這裏同時也懷念那位好友，感謝他的鼓勵和幫助，使過去的這一年，不致平淡。

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於交大九龍